

中国故事中的“三重辩证关系”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长篇小说述评

□李静

本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长篇小说获奖作品,在“大与小”“虚与实”“古与今”这三重辩证关系中,讲述了当代中国故事。作家以高度开放的视野,努力拥抱当代中国文学共生共和的辽阔版图,在与时代相伴而行的过程中推陈出新,为多元一体的文学图景绘就新的篇章

纵览参评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百余部长篇小说,不难发现其中形成的几种主流叙事模式:或以个人奋斗、家族传承、地域发展为缩影,以线性之轴推演“成长史”,展示历史的沧桑变幻;或深描特定时空的民族文化,细剖多种文化的交织互动,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交互中展开自己的故事;或立足于当代视野,勾勒新时代境遇下文化转型与交融的进程。当然,也存在跳脱民族题材的多元故事。综而观之,可谓丰富、开阔且充满当代气息。以最终获奖的长篇小说《阿娜河畔》《烟雨漫漓江》《大医》《在高原》等为例,可以更具体、更典型地观察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新趋势与新成果。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另一部获奖作品《花儿永远这样红》以维吾尔文写成,受限于语言能力,本文暂时无法涉及。但毋庸置疑,这五部获奖作品提示我们应当以高度开放的视野,去努力拥抱当代中国文学共生共和的辽阔版图。

上述四部获奖作品当然各具风格,但若合而观之,也存在共通的创作特色与美学追求。显示出讲述当代中国故事的趋势与特点。具体来说,可以在“大与小”“虚与实”“古与今”这三重辩证关系中加以考量。对这三重关系的处理,无疑考验着作家的认知能力与写作功力。

第一,大与小的辩证。以文学书写抵达宏大叙事,实现个人与集体、审美与历史的辩证。这四部获奖作品的共同点是既具备跨越数十年甚至百年的历史纵深,又充盈着灵动鲜活的个体生命经验,从而避免了口号化、公式化的创作陷阱。作为兵团二代,维吾尔族作家阿舍创作《阿娜河畔》的动力源于故乡消逝(兵团农场合并),阿娜河是塔里木河的古称,阿娜在维吾尔语中是母亲的意思。小说正是以生命源头的记忆打底,创造出“茂盛农场”这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缩影与典型,书写出建设者们自20世纪50年代至新世纪的生活历程,以家庭叙事与大历史实现共振。藏族作家尼玛潘多的《在高原》也持有相近构思,以一家四代人的经历,映照西藏近百年的社会发展历程,在家族叙事中揉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动态历史。与阿娜河温情注视着兵团故事类似,

瑶族作家光盘的《烟雨漫漓江》是一曲动人的漓江儿女生活史、情感史,他们的命运在城乡结构、生态保护的大背景下徐徐展开。这类作品着重描绘亲情、友情、爱情,以此“叠印”大历史之于个体的影响,既具备足够的心理与情感深度,又能将之放入大历史中加以形塑与拓展。

满族作家马伯庸的《大医》则相对跳脱出作家的实际生活经验。他的创作可以追溯到2017年参观上海华山医院校史馆的经历,最终由《日出篇》与《破晓篇》上下两部构成。这一共计80万字的鸿篇巨制写出20世纪前半叶医疗史的宏阔图景,“大医”之名,取自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其所代表的爱国情操、人道情怀与理想主义信仰,具体落实在三位主人公(方三响、孙希、姚英子)身上,更散落在星云璀璨的人物群像之上。三位主人公各具典型性,分别代表穷小子、海外精英与富家千金三种人物类型,他们正是在接连不断的历史大事件中互相扶持、救死扶伤,最终成长为一代大医。

可以说,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无可亲、可感,作家为他们付出了全部的爱意与热忱。历史与现实那些活生生的人,那些在大历史中容易被遮蔽和遗忘的普通人,正是作家们的心之所系。马伯庸自信仰人民史观,正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而尼玛潘多自《紫青裸》以来的创作,也被评论家指出鲜明的女性特色,女性在她的作品中是充满能动性、有着自身成长线索的历史主体。这些都体现出文学创作在个体视角与宏大历史之间勾连转圜的独特价值。

第二,虚与实的辩证。发扬文史互动的文化传统,以历史经验激活文学的创作能量。这四部小说的写作均有不小的难度,作家们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根据阿舍的创作谈,她自2016年起就开始专门搜集与兵团有关的资料,包括兵团教育、兵团水利、解放新疆史料、早期妇女进疆史料、知青进疆史料等,还包括各团场史志丛书、个人口述史以及专题论文,等等。同时,她还有意识地采访家乡亲友。这一认知扩充的过程,使得她对兵团的追忆“不再是自我的、碎片化的、怀旧式的、图解式的、浮光掠影

式”的(阿舍语),而是在浩大的生命旅途与时代印痕中铺展为更广阔的画卷。马伯庸则大量涉猎上海华山医院院史、上海《申报》、清末民初中国红十字总会历史资料及近代医疗史等专业文献,甚至每天翻阅《申报》以便全身心地浸润于彼时的海派文化。光盘怀抱漓江立传的宏愿,设计了深入漓江流域的采风计划,花费三四个月的时间定点采风,与当地村民、猫儿山自然保护区护林员深度交流,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

记者出身的尼玛潘多有着对于新闻事实的敏感,但如她所说,文学相比而言有着更为细致的生活底色。作家们最核心的能量爆发于虚构与再造之中,他们以高度自觉的艺术选择(包括结构、节奏、语言、人物等)去点滴建造出那个可信、可感、可读的文学世界。阿舍特意选择朴素的现实主义策略去匹配硬朗坚毅的兵团历史,以“万川归海式”的叙述结构(谢尚发语)去传递兵团人的精气神。小说沉稳明净的叙述语态,仿佛在应和着阿娜河的低语。在小说人物成信秀的眼中,“阿娜河静静流淌,夕阳金红色的光芒越过河对岸浅金色的芦苇丛,斜洒在河面上,照得宽阔的河面一片金光闪烁……苍茫、宁静,一种于地老天荒之后仍立于不败之地的朴素,没有悲伤,更没有浮华,只有令人心绪澎湃的辉煌”。朴素,辉煌,一如文字的腔调。《大医》延续了马伯庸“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三治写作法”确保了历史观念与生活细节的真实性,而在历史的空白处则大加发挥,敷衍成篇。《大医》虚构的三位主人公,牵引出三线并进的高密度叙事结构,充满戏剧性与画面感,并以限时的时间结构与迥异的空间经验催生出故事的紧迫感。《在高原》使用了双线叙事来扩充历史容量,在呈现西藏当代日常生活方面,则选取了朴拙却又充满意蕴的语言,还经常调用民间俗语来烘托故事的烟火气。《烟雨漫漓江》由“春绿柳”“水立夏”“风动秋”“冬日暖”四个篇章推演而成,与其生态小说的定位相得益彰。在环环相扣的叙事节奏中,小说从容地生成了四季流转、生生不息的漓江故事。

第三,古与今的辩证。以当代关怀激活历史脉络,承担着当代人的问题意识与美学追求。《阿娜河畔》不只是献给父辈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70年历史的致敬之作,同时也是带有当下问题意识的文学启示录——“人必将置身于自己的时代,必将被风浪所裹挟,然而作为个体的你将怎么办?你将使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即便所有的努力只是一场徒劳,你又该怎么办?所以,我所渴望的是——通过书写一个两代建设者的故事来呈现并保护住那些明净顽强的心灵。”(阿舍语)反思当下的精致的利己主义与极端的个人主义,是阿舍压在纸背的关切。《大医》以医疗史为切口,唤起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的无数读者的共鸣,马伯庸非常善于提炼古与今之间的精神共性,将历史引渡进当代大众生活之中。《在高原》突破了先锋化、景观化、神秘化的西藏书写,致力于写出“原生态”的、当下的西藏。尼玛潘多对此是高度自觉的:“在众多表现西藏题材的文学作品中,西藏或是神话和玄奥的产生地,或是探险和猎奇的代名词,唯独缺少对西藏现实及普通人的关注,所以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剥去西藏的神秘与玄奥外衣,以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展现跨越民族界限的、人类共通的真实情感。”《烟雨漫漓江》对于城乡结构与新乡土生活的思考,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追问,对于自然生态的神圣性的开掘,也都是现代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之后的“时代之问”。

上述作品从辽阔的戈壁写到风雪交加的高原,再到烟雨弥漫的漓江,甚至抵达《大医》所构建的全球视野,一座座“文学地标”拔地而起,一处处“文学地理”变化万端。其中所涉及的大与小、虚与实、古与今的三重辩证关系,既彰显出创作的难度,又体现出最新的创作水平。未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将在文学观、历史观、审美创造力等多重维度继续突围,在与时代相伴而行的过程中推陈出新,为多元一体的文学图景持续绘就新的篇章。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



现实世界的精神探索,或平凡人物的动人故事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短篇小说述评

□徐刚

本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短篇小说获奖作品,或是在寻找中融入对于社会人生与个体命运的思索,或是寄予文学向理想生活致敬的决心,或是探索精神世界如何安放,或是展现平凡人物的动人时刻,共同构成4年来少数民族文学中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本次骏马奖共有64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短篇小说集和11部少数民族文字中短篇小说集参评,经过评委会严格评审,最终,蒙古族作家阿尤尔扎纳的《蓝天戈壁》(蒙古文)、彝族作家包倬的《十寻》、壮族作家凡一平的《上岭恋人》、蒙古族作家娜仁高娃的《驮着魂灵的马》、土家族作家少一的《月光紧追不舍》5部作品脱颖而出。这5部作品凝聚了评委们的高度共识,从不同方面体现了过去4年少数民族文学中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成就。

云南彝族作家包倬的小说集《十寻》,多以“阿尼卡”这个作者苦心经营的文学地标展开。在包倬这里,阿尼卡犹如一道桥梁,一边连接着古老民族的蛮荒山区,另一边连接着绚丽斑驳的现代都市。其间,怅然若失的人们,往往陷入无尽的寻找之中。于是,寻找构成了小说集《十寻》的共同主题,这大概也是我们永恒的文学主题。《十寻》里的寻找,显然有着多重意涵。它可以是寻找行而下的具体事物,比如《找啊找》里神秘被窃的钢笔,或《驯猴记》里突然失踪的猴子和驯猴师的孤独感,以及孤独之中对于理解的执着探寻;《亲爱的困兽》里的马小明和周虹,是两个走投无路的人,他们游荡在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只为找寻一条生路;《圣诞快乐》里两个互不相识的人,怀着各自的创伤,他们要寻找一次倾诉的契机。在《天空之境》里,孤独的孩子决定寻找外面的世界;而在《新婚快乐》里,来自阿尼卡的老莫寻找被早已送人的女儿,在欢乐的婚礼现场,他承受着不敢相认的煎熬,只能默默守候与祝福;或者如《生日快乐》里30岁的朱丽,她执意要

在阿尼卡为自己轰轰烈烈地办一场生日宴会,希望借这种告别的方式寻找一次新生。这便是《十寻》的故事,包倬借助他笔下的阿尼卡人物,探索现实世界的精神可能性,这正是他的小说能够打动人的地方。

继《上岭村的谋杀》之后,广西壮族作家凡一平携小说集《上岭恋人》重新归来。这部作品同样植根于想象中的“上岭村”,却祛除了前作耸动的案件奇观和尖锐的现实指向,总体上更倾向于讲述那些“带有泥土气息的故事”,希图从细腻平和的日常生活中发掘人性的良善与光亮。“故土的微光,若流萤翩飞于人间,字里行间闪烁着人的善与仁。”《上岭恋人》并没有铭刻什么恢宏的时代主题,也无意呈现厚重的社会历史,它只为了记取最平凡的人物和最动人的故事,进而提炼些许寓言般朴素的人生教益。小说集开篇便塑造了女主人公韦莲不为负心郎所遣巨额财产而心动的高尚形象,此后的《上岭侦探》《上岭产婆》《上岭说客》《上岭裁缝》《上岭保姆》等篇目,生动记录了上岭村形形色色的人与事,描绘了一幅颇具地方风情的质朴画卷。这里有竭力维护家庭和睦的退休警察,有收养弃婴助人为本的传奇产婆,有重教益胜过实利的乡间说客,有游走乡间只为收徒传艺的奇怪裁缝,更有以德报怨、重义轻利的住家保姆。甚至如《的确良》里养羊的樊山楂,或《靠名字吃饭的人》中“靠名字吃饭”的“包平安”等,这些生活在上岭村的人物,他们都干着低微的工作,却不为世俗的名利所惑,依然葆有最朴素的人情伦理,闪烁着最崇高的人性光辉。小说中远离尘嚣,极具道德理想主义,甚至带有某种乌托邦色彩的“上岭村”,或许正是作者默默对抗世界利诱、守护人性光芒的生动体现。大概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小说寄予着某种向理想生活致敬的决心,作者用他的倔强和坚持,告诉我们每个人,这平凡而动人的一生究竟应该怎样度过。

蒙古族作家娜仁高娃是近年来炙手可热的青年写作者,相继创作的诸多作品都极为引人注目。她的最新小说集《驮着魂灵的马》立足于其家乡内蒙古库布齐沙漠腹地的“沙窝地”,以深沉舒缓的笔调讲述荒凉贫瘠的草原故事。这里的作品并不刻意追求激烈的情节冲突和戏剧化的文本效果,而更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充分挖掘,思索更加深邃的精神命题。比如她总会尝试讨论草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命题,思索草原文明该何去何从。《驮着魂灵的马》这篇讲述的便是牧人社会在变迁中的迷失。在草原世界里,马的意义非同寻常,不仅所有的马都有名字,而且死去马的头骨还会被主人妥善归置。然而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牧人心中“不会说话的王子”终于失去了用武之地。于是,飞驰的骏马相撞而死,这一惨烈的偶然事件所包含的隐喻意义就不言而喻了。在娜仁高娃这里,“驮着魂灵的马”消失了,失魂落魄的人们同样无处安身。

在草原世界里,万物都有魂灵,而所谓的魂灵,不是一种缥缈的概念,也不是一种虚幻的依附,它意味着生命的尊严。就像《裸露的山体》所说的,“一个高贵的魂灵即便是被囚禁在卑微的躯体里,也不会忘记唱出最动听的歌”。娜仁高娃惯于写世界的沉重,以及比这更沉重的死亡,但她更善于写普通人的人情温暖,比如自由、尊严,还有爱。是的,她也写了无比深沉的爱。就像《戈壁》里独行者的父亲那样,他总会用一个阿如戈(柳条编的大筐子)背着精神失常的妻子,不离不弃。以至于小说最后,作者忍不住感慨:“我们活一回,其实终究是在寻找一个可以把你装在阿如戈里到处走的人,或者说,在寻找一个你想装在阿如戈里的人。”因此,《驮着魂灵的马》不仅体现了草原文化的特殊性,更体现出有关现实世界精神探索的普遍命题。

湖南土家族作家少一的小说集《月光紧追不舍》生动讲述了武陵山区的基层警察故事,展现了湘鄂边地的独特民情,以及结合辅警、巡警、内勤女警、森林警察、驻村警察等诸多警种的各种故事。可以说,《月光紧追不舍》为我们倾情勾勒

了新时代基层警察队伍的众生相和平凡英雄的工作史。小说全无大案要案等扣人心弦的耸动情节,只有“偷萝卜偷玉米偷腊肉”之类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甚至还有“偷鸡饲料”等离奇情节及背后苦涩无奈的曲折故事,却能由此看出乡村世界基层治理的独特面貌,进而成全小人物们平凡中的不凡和渺小的伟大。在少一笔下的警察世界里,五年的基层工作,并不是所有人都甘愿接受的,但恰恰是他们,“既来之,则安之”,兢兢业业地干出了诸多不凡的业绩。这里的小警察们,不仅要如《突如其来中午》里的内勤女警那样那样,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各项工作,这便让基层治理的故事体现出丰富立体的面貌。总的来看,《月光紧追不舍》情节鲜活真实,叙述生趣盎然,却又意蕴悠长,感人肺腑,让人看到了平凡人物的动人瞬间。尤其是,每每在最后时刻,小说总能适时出现情节陡转,以此突显作者于现实的“芜杂”中竭力捕捉人性光亮的决心。比如《晚节不保》的官员行止,但在一番“周折”之后,都被悉数证明,一切只是误会,小说由此也不断兑现着基层工作者的良善、信义和坚守,读来不禁令人心生温暖。

此外,四川藏族作家尹向东的《河流的方向》对于当下藏民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呈现,对于民族风情和地域文化的深度开掘;新疆维吾尔族作家瑞朵·海瑞拉的《永恒的刻度》从女性成长的个人化角度对小说情感的细腻把握;宁夏回族作家马悦的《飞翔的鸟》立足地方性,对女性坚韧力量的书写,对民族团结的积极弘扬;以及云南傣族作家李司平的《流淌火》以独特的荒诞风格对人性光亮的执着期待,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4年来少数民族文学中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